

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机制探究 ——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咎宇蝶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为探究乡村治理积分制对治理效能的提升机制, 以村民参与行为为中介变量、制度信任为调节变量, 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选取F市S镇为案例地进行数据收集, 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乡村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村民参与行为在二者间发挥显著正向中介作用; 制度信任在积分制与村民参与行为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且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研究证实, 积分制通过激发村民参与、依托制度信任赋能, 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最后, 从优化激励联结、规范制度运行、培育制度信任等方面提出实践启示, 为乡村治理积分制提质增效提供实证依据与参考。

关键词

乡村积分制, 制度信任, 村民参与, 乡村治理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Points System on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Yudie Zan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ne 1, 2026; accepted: July 16,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rural governance points system improve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ith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own S in City F as the case area, and empirical tests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governance points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al trust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points system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is confirmed. This study verifies that the points system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by stimulating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ing govern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trust. Finally,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ptimizing incentive linkages, standardizing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and cultivating institutional trust,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and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points system.

Keywords

Rural Points System, Institutional Trust,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Rural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治理有效”是关键的保障因素和核心环节。强化乡村的管理和治理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基层的矛盾和冲突，还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国乡村社会正经历深刻转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催生的农村“空心化”问题、非正式制度失灵、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动力不足[1]，共同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困境，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乡村治理需求，亟需创新治理工具破解难题。在此背景下，乡村治理积分制凭借其行为量化考核、柔性激励引导的核心特性，将抽象的治理要求转化为具象的行为指标，不仅有效调和了行政主导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张力[2]，更在实践中展现出通过激发村民参与、培育制度信任进而提升治理效能的潜在逻辑，成为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

2020年7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此，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工作全面启动。之后，学界针对乡村积分制的相关研究也纷纷涌现。

关于积分制的研究大多以案例形式呈现出组织、多元主体、资源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复杂作用机制。积分制是将科层治理任务与乡村内生需求结合起来的创新实践[3]，共建共治共享是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4]。乡村积分制治理的有效运行需要契合乡村公共价值导向、具备相应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5]。积分制通过规则化竞争，激活面子意识，重塑利益认同以及多元力量的参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6]。并通过将生活领域的道德资源转化为公共领域的治理资源，将隐性和柔性的道德要素转化为显性和刚性的治理工具，最终促进了乡村生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的功能整合[7]。在村治内生动力增强、村民利益诉求增加、村庄治理事务增多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积分制具备动力生成、行为塑造与目标管理三大递进性激励机制[8]。一系列正向激励能够激发村民参与积分制的热情，有效推动村民参与乡村事务，通过正外部性行为的增益，实现村庄治理效能的提升。

此外，村民通过参与积分制进而加入到乡村治理活动这一行为，是在一定制度框架和社会情境下的

自主决策行为。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探究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机制还需要引入情境性因素，即制度信任。信任作为合作的前提与基础，其强度决定了合作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制度信任不足是制度参与较低的主要原因[9]。乡村积分制作为一项新制度，其推广若不能获得村民这一行为主体的认同与信任，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农民的合作困境[10]。为了正向提升村民的合作参与行为，制度信任通过建立共享机制、合作机制和约束机制，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的基础上，可以提高农民对于制度的参与意愿[11]。基于此，本文将制度信任引入乡村积分制-村民参与行为-乡村治理绩效这一研究框架中，试图揭示制度信任对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行为的调节作用。

当前，积分制在乡村治理中已涌现出诸多转化应用治理效能提升显著的案例，如广东佛冈县通过微信小程序实现积分“申报-审核-兑换”全流程线上化，保障流程透明，有效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实现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宁夏J县则通过“5223”模式整合行政、市场、社会资源，建立了稳定的奖励保障机制[4] [12]，增强村民对奖励机制的信任度，进而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保障了积分制的可持续运行与治理效能的长效提升。这些实践案例表明，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并非简单的线性作用，而是以村民参与行为为中介载体、以制度信任为调节保障的复杂作用机制，这也正是本研究聚焦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探究的关键。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对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逻辑、实践成效及其与治理效能的关系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普遍肯定了积分制的积极作用，并初步揭示了其通过行为激励、道德转化和共同体构建等路径提升治理效能的内在机制。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以下明显不足：其一，理论机制阐释尚显碎片化，缺乏系统整合。多数成果聚焦于个案描述或单一维度分析，缺乏对村民参与行为在积分制影响治理效能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其二，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量化证据不足。现有文献多依赖典型案例或质性访谈，缺乏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导致结论的普适性与因果推断力受限。因此，亟需构建一个融合中介与调节机制的整合型理论模型，来更精准地揭示积分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复杂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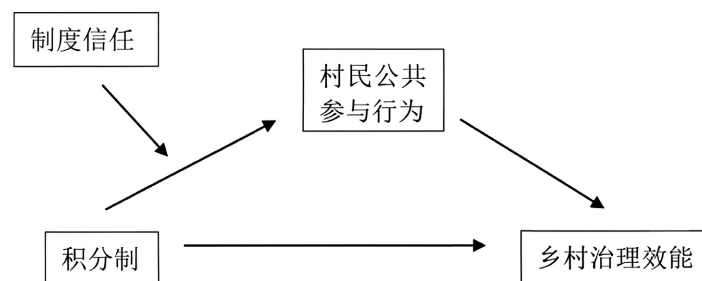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2. 研究假设

2.1. 积分制和乡村治理效能

积分制管理这一概念于 2003 年在我国提出，最初应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由于该制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极高的适应性，能够灵活运用于多种场景，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延伸至公共管理领域。尤其是在基层治理方面，积分制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乡村治理积分制是积分制在乡村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其作为一种“柔性”的乡村治理工具被各地引入乡村治理中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积分制在乡村治理中的适用性首先在荆门市掇刀区白石坡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随后逐步推广至乡村治理领域，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积分制”模式[13]。积分治理通过明晰事项范畴、明确指标分值，并辅以必要的奖惩手段，实现了乡村治理内容的具象化、治理过程的透明化以及治理结果的公开化，从而呈现出一幅“清晰”的乡村治理图景[14]。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在乡村社会结合现实情况的具体实践。学者们围绕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特点及服务内容等维度，对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与阐述。具体而言，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及其他乡村权威组织，向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其基本目标在于维护乡村社会的基本公正、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15]。在治理过程中，往往需要采取行政化手段，依托国家自上而下的策略与农户进行沟通，从而直接回应农民的实际需求，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国家治理[16]。

积分制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创新性实践，其产生和运行不仅源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也根植于乡村社会的内生需求。乡村积分制在国家与农民关系转型、乡村社会共识渐趋离散背景下，通过共识再造、公共性再生产为重建国家与农民、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一种中介性的联结路径，也为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及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17]。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乡村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村民参与行为的中介作用

乡村治理的主体是村民，因此乡村治理有效与否的关键，是村民能否制度化、规范化地参与乡村公共事务[18]。组织制度视角认为，我国现有的组织结构与政府主导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民的参与意识，不利于良好参与局面的形成[19]。然而，从个人利益层面来看，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程度与其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利益相关度直接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其参与动机往往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参与行为的基础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成本与收益的预期。此外，村民的有效参与不仅需要自身的意愿与能力，更离不开相应的参与条件、制度与保障[20]-[23]。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需要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其既能满足村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又能与乡村实际的治理需求有效结合。

当前，村治内生动力增强、村民利益诉求增加、村庄治理事务增多，积分制通过将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产品供给与个人行为挂钩，并将合作社利润分配与积分挂钩等方式，有效重塑了利益认同[24]。这一机制将村民个人利益与乡村治理需求深度融合，激发了村民对乡村的集体认同感，增强了乡村凝聚力。积分制治理将原子化的村民转化为乡村公共空间中的协同共治主体，将生活领域的道德资源转化为公共领域的治理资源，最终促进了乡村生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的功能整合[7]，从而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调动了其参与行为。积分制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导向激活治理末梢，以尊重农民地位为基石转变互动模式，并以扩大农民选择为平台强化监督制衡[25]。在设计得当并有效实施积分制的乡村中，村民的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村庄治理效能也实现了有效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村民参与行为在积分制和乡村治理效能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中介作用。

2.3. 制度信任的调节作用

信任能够有效推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政治信任——即公民对政治参与行为的认可及与政治权威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26]。只有在相互信任的环境中，组织才具备凝聚力和号召力，主体间才能有效协商，个体才可能达成集体行动，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也才能顺利发展[27]。已有研究指出，制度信任主要源于公众对政府诚信和透明度的感知，是对政府能否实现自身预期的一种判断[28]。公众对制度信任的缺失，往往是导致制度参与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乡村治理中，村民的有效参

与离不开制度层面的赋权、保障与规范。制度的规范性作用不仅界定了村民参与的范围，保障了参与权利的行使，还规范了参与流程[29]。唯有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应用，才能切实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参与率，这也是积分制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热点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村民对政治行为的认可度越高，其政治参与行为便越积极主动[30]。乡村积分制在实际运行中契合乡村公共价值导向，依托必要的资金资源与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从而有效增强了村民的参与效能感与行动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制度信任在积分制和村民参与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调节作用。

3. 数据来源、变量描述与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F 市 S 镇这一优秀积分治理案例所在地的村民。2025 年以来，S 镇推行移风易俗积分制管理，通过“行为换积分，积分兑奖励”的模式，让文明乡风有了“标尺”，更让村民有了获得感。目前，S 镇全镇已建成 8 个积分超市，每季度，各村通过道德评议会张榜公示积分情况，让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为构建和美乡村再添动力。本研究于 2025 年 12 月~2026 年 3 月期间前往 S 镇通过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收集，共获得问卷 416 份，有效问卷 385 份。

3.2. 变量选取及描述

本研究选择的测量量表均参考国内已验证的信效度较高的成熟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并结合研究需求进行了适当调整。

3.2.1. 因变量

本文以乡村治理效能为因变量，借鉴苏岚岚、吴春梅等编制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乡村治理效能测定量表[31][32]，并结合本研究实际进行了适当调整。主要题项包含：村庄集体经济得到发展；村民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村里公共设施的修建和完善公平开放，能满足村民的休闲需求；村中破旧的水泥路得到修缮，满足出行需要；村中有重大事务、决策时会听取村民意见；村民会自觉对村“两委”（村干部）的工作进行监督；村里公共事务（如修路、清垃圾、调解纠纷等）处理得及时有效；村民之间关系和谐，村里很少出现打架、斗殴、盗窃等治安事件等，分为经济增长、公共服务、公共参与、乡村秩序四个方面。经检验，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923，KMO 值为 0.949 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具有明显显著性，表明测量题项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子分析有效。

3.2.2. 预测变量

1)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乡村积分制，对这一变量的测量参考关于积分制的相关文献[33]，并借鉴相关学者设计的已验证成功的量表[34][35]。相关题项包含：您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规则和内容；您认为积分制度能否完全覆盖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文明行为和公共事务；您认为积分申报、审核、公示和兑换流程是否方便且透明；你是否愿意为了获取奖励而参与到积分制相关行动中；结合您的实际情况，您在过去一年中参与乡村治理积分制相关行动的情况如何。经检验，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879，KMO 值为 0.897 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具有明显显著性，表明测量题项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子分析有效。

2)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村民参与行为，对这一变量的测量参考相关学者的题项设置[36][37]。主要题项包含：积分制实施后，我会主动申报自己符合积分奖励的行为（如好人好事、志愿服务等）；为了获取更多积

分,我愿意参与村内池塘整治、道路修缮等义务行为;我会关注并参与村集体组织的公益活动(如慰问老人、节日庆典等);我会自觉遵守积分制中关于垃圾分类、庭院整洁等方面的规定。经检验,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869, KMO 值为 0.895 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具有明显显著性,表明测量题项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子分析有效。

3)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制度信任,参考借鉴学者关于制度信任的相关研究[38],设置的测量题项包含:我认为当前积分制制度内容设计科学合理,能准确回应村庄需求;我认为当前积分制奖励机制能够对我产生吸引力;我认为当前积分制能够发挥作用,激发村民/我参与到乡村治理活动中;我认为当前积分制符合村庄整体利益;我相信负责积分制执行的工作人员是正直的,他们会公平公正地记录村民的参与行为;我认为通过获取积分得到的物质上的奖励是能够有持续保证的,不会出现积分足够但无法兑换奖励的情况;我认为积分制的实施是合理的,能够激励村民正确行为的发生;总体而言,我对积分制的实施充满热情,并且愿意通过参与村庄事务获取积分。经检验,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941, KMO 值为 0.950 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具有明显显著性,表明测量题项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子分析有效。

3.2.3. 控制变量

综合可能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性因素,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

3.3. 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村民参与行为在积分制与乡村治理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和制度信任在积分制与村民参与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构建如下:

$$\begin{aligned} Y_{rgp} &= cX_{rps} + \beta Z + e_1 \\ M_{vpb} &= a_1X_{rps} + a_2W_{it} + a_3X_{rps} \times W_{it} + \beta Z + e_2 \\ Y_{rgp} &= c'X_{rps} + bM_{vpb} + \beta Z + e_3 \end{aligned}$$

4. 结果与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及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Df	RMSEA	CFI	SRMR
四因子模型	1.427	0.033	0.971	0.046
三因子模型 1 (积分制、治理效能、村民参与 + 制度信任)	3.447	0.080	0.834	0.116
三因子模型 2 (积分制 + 治理效能、村民参与、制度信任)	3.522	0.081	0.829	0.135
二因子模型	5.324	0.106	0.706	0.152
单因子模型	10.100	0.154	0.380	0.263

为规避单一问卷自评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开展同源误差检验。将乡村积分制、村民参与行为、制度信任、乡村治理效能的全部测量题项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本文的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提取出 4 个因子,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6.996%,远低于 40%的临界判定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源误差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有限。

为了检验模型中各构念的区分效度和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本文借助 AMOS 24.0 软件,对积分制、村

民公共参与行为、制度信任和乡村治理效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度的探讨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经过系统的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1 所示。与其他模型相比，四因子模型在各项指标上均显示出更高的符合度，且其表现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因子构建。因此，本文的研究模型经过严格的验证，展现出良好的区分效度。

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通过 SPSS 25.0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见表 2)。积分制与村民公共参与行为($r = 0.167, P < 0.01$)显著正相关，与乡村治理效能($r = 0.275, P < 0.01$)显著正相关；村民公共参与行为与乡村治理效能($r = 0.319, P < 0.01$)显著正相关；制度信任与村民公共参与($r = 0.275, P < 0.01$)显著正相关，为证明假设提供了初步依据。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性别	1.520	0.500	1							
年龄	3.230	0.965	-0.001	1						
受教育程度	2.010	0.965	-0.017	-0.651**	1					
职业	4.640	1.575	-0.044	0.832**	-0.636**	1				
乡村积分制	3.810	0.862	0.002	0.038	-0.149**	0.094	1			
村民公共参与行为	3.901	0.756	0.016	0.056	-0.137**	0.008	0.167**	1		
制度信任	3.649	1.051	-0.067	0.078	-0.082	0.071	0.362**	0.275**	1	
乡村治理效能	3.843	0.790	-0.002	0.029	-0.107*	-0.006	0.275**	0.319**	0.100*	1

4.3. 中介效应及主效应检验分析

Table 3. Tests of mediating and main effects
表 3. 中介效应及主效应检验

变量	村民公共参与行为			乡村治理效能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常数项	4.431	3.832	4.413	3.329	2.259
控制变量					
性别	0.007	0.006	-0.019	-0.021	-0.022
年龄	0.062	0.088	0.034	0.080	0.055
受教育程度	-0.161	-0.137	-0.146	-0.103	-0.065
职业	-0.090	-0.101	-0.077	-0.097	-0.068
自变量					
乡村积分制		0.137**		0.248***	0.209***
中介变量					
村民公共参与行为					0.279***
R ²	0.031	0.055	0.021	0.092	0.159
ΔR ²	0.031	0.024	0.021	0.071	0.068
F	3.052	4.384	2.050	7.646	11.930
ΔF	3.052	9.437	2.050	29.417	30.386

本文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研究的理论模型，详细结果见表 3。为了探究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并验证村民公共参与行为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初步引入控制变量，并逐步加入了因变量以及中介变量进行分析。根据模型 4 的分析结果，发现积分制显著正向影响乡村治理效能，支持了第一个假设。从模型 2 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积分制对提升村民公共参与行为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模型 5 中，引入一个中介变量村民参与行为后，发现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仍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2 得到支持。

4.4. 调节效应检验分析

为了检验制度信任在积分制与村民公共参与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根据实际需要，构建了乡村积分制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并将其纳入模型，如表 4 中的模型 3 所示。数据分析结果揭示了积分制与制度信任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行为。这表明，村民对于制度的信任感在积分制与其公共参与行为的发生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从而假设 3 得到支持。

Table 4. Test of moderating effects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分析

变量	村民公共参与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数项	4.431	3.497	2.316
控制变量			
性别	0.007	0.031	0.058
年龄	0.062	0.064	0.016
受教育程度	-0.161	-0.139	-0.126
职业	-0.090	-0.094	-0.052
调节变量			
制度信任		0.176***	0.234***
交互项			
积分制 × 制度信任			0.276***
R ²	0.031	0.106	0.252
ΔR ²	0.031	0.075	0.146
F	3.052	7.482	18.177
ΔF	3.052	15.865	73.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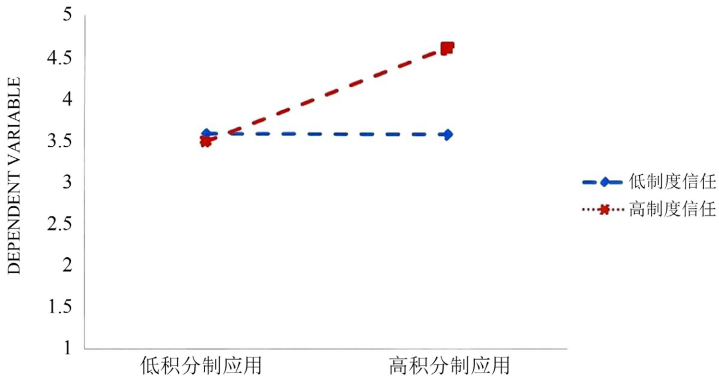


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 plot
图 2. 调节效应图

本研究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如图 2 所示),以更加直观、清晰地展现出制度信任的调节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积分制应用良好的 S 镇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积分制在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机制。总结了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积分制的应用对乡村治理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积分制应用得越好,乡村治理效能就越高。第二,积分制通过刺激村民参与行为的发生进而推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这一结论明确了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路径,验证了村民参与行为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第三,制度信任对村民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乡村治理效能的定量前因变量研究,更揭示了积分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内在作用机制。这不仅为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也为理解乡村治理创新工具的运行逻辑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视角。

5.2. 启示和讨论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积分制通过刺激村民参与行为的发生来推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因此积分制的设计与实施应始终以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主性为核心目标。首先,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可以强化积分制的利益联结机制,将积分与村民的实际利益相挂钩,除物质奖励外,还可以将积分与村集体经济分红等相衔接,丰富积分的激励形式,提升村民参与的获得感与积极性;其次,村“两委”要搭建多元化的村民参与平台,以积分制为纽带,引导村民参与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乡风文明建设等各类公共事务中,推动村民从“被动接受治理”向“主动参与治理”转变,培育乡村治理的多元共治主体;同时,要注重提升村民的参与能力,通过村规民约宣传、积分制规则讲解、公益活动组织等方式,增强村民的集体意识与公共参与意识,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

此外,研究表明村民制度信任感的升高会促使其主动参与到积分制和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即制度信任在积分制与村民参与行为之间存在叠加作用。因此,各地在推行积分制过程中,应把培育村民的制度信任放在重要位置。首先,村委全流程公开规范积分运行机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共同商议积分细则、分值标准、兑换规则,借助线上小程序、村务公开栏同步公示每日积分申报、审核、扣分记录,同时设立村民监督小组复核积分台账,从程序公平层面消解村民对“暗箱操作”的顾虑,优先补齐制度信任短板。其次,持续提升积分制规则体系设置的科学性与适配性,工作组在具体设置积分项目和兑换机制时可以依托村民代表大会、村务协商议事会等制度化沟通载体充分吸纳村民诉求,推动积分细则贴合村庄发展实际、反映群众真实意愿,从源头增强村民对积分制度顶层设计的认同程度;最后,基层政府和村“两委”要共同建立稳定的积分奖励保障机制,借鉴先进案例整合行政、市场、社会各类资源,确保积分奖励的可持续性,避免出现“积分无法兑换”的情况,提升村民对制度保障的信任度。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共同发力培育村民的制度信任,为积分制激发村民参与行为提供良好的制度情境,充分释放积分制的治理效能。

本文虽然通过实证检验了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机制,但仍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1)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F 市 S 镇这一积分制实施效果较好的单一案例区域,样本的地域代表性有限,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受到一定影响;2) 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未能捕捉积分制、村民参与行为、制度信任与乡村治理效能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难以揭示变量间的长期作用机制。针对上述研究局限,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调研样本的地域范围,选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积分制实施阶段的乡村进行

跨区域调研,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可以采用面板数据或追踪调查的方式,开展纵向研究,揭示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动态影响机制,分析积分制在实施不同阶段的作用特征,为乡村积分制的优化与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更精细化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万可歆,胡鹏辉.“榜”治:乡村积分治理的仪式化实践与互构机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148-157.
- [2] 许源源,杨慧琳.“动因-过程”视角下的积分制:产生、运行与效能——基于湖南省D村的个案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2(11):89-97.
- [3] 陈东洋,郭圣莉,王阳.面子再生产:积分治理有效的中介机制——基于浙江省T村社区治理的经验[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4,25(4):83-96.
- [4] 马树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的实践考察[J].宁夏社会科学,2020(4):133-138.
- [5] 马改艳,徐学荣.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基于“三圈理论”的解释框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5,24(2):185-194.
- [6] 李卓,王远卓.高位推动与基层响应: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以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为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5(6):122-133.
- [7] 郝炜,赵培茜.乡村积分制治理的三维内涵与实践逻辑——以山西省P县“道德银行”为例[J].新视野,2024(1):121-128.
- [8] 李海金,鲁勇超.激励视角下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机理和治理效果——基于鄂西X村的实证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4):40-49.
- [9] 李佳,杨燕绥.“新农保”制度信任机制构建的社会治理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8(1):3-12.
- [10] 黄家亮.乡土场域的信任逻辑与合作困境: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81-92.
- [11] 何可,张俊飏,张露,等.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J].管理世界,2015(5):75-88.
- [12] 张小娟,史传林.公共性再生产:数字化积分制何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广东省佛冈县数字化积分制的案例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5,22(2):114-127+173-174.
- [13] 何得桂,吉李敏.国内学界的乡村治理积分制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J].社会科学论坛,2020(5):24-25.
- [14] 汪波,周其鑫.乡村治理的清晰性理路及其操作逻辑——基于“积分制”实践的解构[J].农村经济,2024(11):56-66.
- [15] 党国英.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1-17.
- [16] 贺雪峰.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性与基层治理有效[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6(1):166-174.
- [17] 胡可欣.再造共识:积分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6,25(1):81-89.
- [18] 贺璇,杨婷婷.从意愿到能力:积分制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学习机制——基于X镇的纵向案例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9(6):108-117.
- [19] 胡乃元,苏苒秋,朱玉春.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陕西、宁夏两省份数据的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2,27(9):261-271.
- [20] 刘义强,姜胜辉.利益与认同:村民政治参与的边界及转换——基于佛山市4个村庄村级治理的实证调查[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6):53-59.
- [21] 汪杰贵.村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与进路——基于3个典型案例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0(4):133-142.
- [22] 张健.主观意识、社会互动与村民的参与行为——NGO项目运作的质性社会学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2(2):47-51.
- [23] 邓大才.有效参与:实现村民自治的递次保障[J].财经问题研究,2019(4):3-11.
- [24] 王印红,丁慕蓉.重塑认同:积分制何以推进乡村治理[J].中国农村观察,2025(1):145-163.
- [25] 唐丽霞,丁悦.激励、引导和规制: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何以有效发挥?——基于积分制、村规民约和农村

- 综合信用体系的对比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8): 144-150.
- [26] 王春伟, 管蕊蕊. 村民政治参与逻辑与行为选择——基于山东 D 村的个案研究[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4): 26-30+47.
- [27] 胡伟斌, 黄祖辉. 集体产权改革与村庄信任增进: 一个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2(8): 28-46.
- [28] 李德国, 蒋文婕, 蔡晶晶. 个体规范与公共行动: 制度信任如何促进公众回应性参与?——基于城市水环境诉求的文本数据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2, 19(2): 117-129+173.
- [29] 朱蓬瑞. 乡村建设行动中提升村民参与质量的逻辑——以湖北省 C 村为例[J]. 中国农村研究, 2022(1): 203-216.
- [30] 曾学华. 村民选举制度创新与农村社会风险规避[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2): 35-41+125.
- [31] 苏岚岚, 赵雪梅, 彭艳玲.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J]. 电子政务, 2023(7): 57-72.
- [32] 吴春梅, 邱豪. 乡村沟通网络对村庄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张珩村和邢家村的调查[J]. 软科学, 2012, 26(7): 75-80.
- [33] 向楠, 乐章. 积分制对农民参与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基于鄂西山区 607 份农民调查数据的微观证据[J/OL].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1-15.
<https://www.cnndoi.org/Resolution/Handler?doi=10.19741/j.issn.1673-4831.2025.0323>, 2026-03-09.
- [34] 邢增烜. 农户对乡村治理积分制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海南省琼中县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24.
- [35] 王馨宇. 宁夏 Y 县乡村治理积分制效果评价及优化路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银川: 宁夏大学, 2024.
- [36] 上官莉娜, 魏楚珂, 杜玉萍.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1): 54-63.
- [37] 郑建君. 政治效能感、参与意愿对中国公民选举参与的影响机制——政治信任的调节作用[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58(4): 10-18.
- [38] 徐旭初, 徐菁, 吴彬. 乡村数字治理技术采纳对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以政治效能感为中介变量[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3(6): 89-101.